



PHILOSOPHY
BEYOND
BORDERS

跨越边界的哲学

—— 挪威哲学文集

G·希尔贝克 编
童世骏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CHUBANSHE

PHILOSOPHY BEYOND BORDERS
跨越边界的哲学

—— 挪威哲学文集

G·希尔贝克 童世骏 编
童世骏 郁振华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1999-5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挪威)希尔贝克,
童世骏主编;童世骏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
99.10

ISBN 7-213-01881-7

I.跨… II.①希… ②童… ③童… III.哲学-挪威-文
集 IV.B5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942 号

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

G·希尔贝克 童世骏 编

童世骏 郁振华 等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号)
责任编辑 杨淑英
封面设计 池长尧 顾 页
责任校对 李育智 戴正泉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杭州玉泉)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6.7万 插 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881-7/B·57
定 价 23.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导言
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
- 13 怎样对知识对象和知识内容作行为描述?
阿恩·内斯[Arne Naess]
- 29 不同总体观点之比较
阿恩·内斯[Arne Naess]
- 43 说到底只能有一个有效的总体系统?
阿恩·内斯[Arne Naess]
- 57 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
阿恩·内斯[Arne Naess]
- 64 客观主义和对人的研究
汉斯·谢尔瓦姆 [Hans Skjervheim]
- 91 行动者及其世界
雅可比·梅里奥[Jakob Meløe]
- 114 研究的规范:作为规范性体系的方法论
K. E. 特伦诺伊[Knut Erik Tranøy]
- 129 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
达格芬·弗莱斯达尔[Dagfinn Føllesdal]
- 146 合理性和客观性的条件
英格蒙德·古尔维依[Ingemund Gullvåg]
- 161 作为反思的观察:对内斯早期哲学的一个评论
奥顿·奥夫斯蒂[Audun øfsti]

- 191 市场与论坛：三种政治理论
 杨·埃尔斯特[Jon Elster]
- 222 社会科学与博弈理论
 奥农德·哈伽[Ånund Haga]
- 245 解释学和日常理解
 杨·海勒斯尼斯[Jon Hellesnes]
- 273 遵循规则、非传递性理解和默会知识
 谢尔·S·约翰内森[Kjell S. Johannessen]
- 304 从“是”到“应当”——演绎还是阐明？
 托雷·诺顿斯坦[Tore Nordenstam]
- 317 从进化认识论到先天生活世界
 拉格纳·费尔兰德[Ragnar Fjelland]
- 339 汉斯·尼尔森·豪格与资本主义精神
 尼尔斯·吉列尔[Nils Gilje]
- 360 合理的分歧和认知的退让
 哈罗德·格里门[Harald Grimen]
- 390 情境语用学与普遍语用学——实践学的语用学与先验语
 用学的相互批判
 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
- 436 参考书目
- 477 人名中西文对照表
- 482 译后记

导 言

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

这本论文集选编了挪威哲学家们从1936年到1996年间所写的一些文章,它缘起于挪威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在文化现代化的理论方面的合作研究。这一合作的正式框架是一个被称为“马可·波罗”的研究项目,它是由卑尔根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家们建立起来的。在我们的中国方面的合作编者童世骏教授,从1988年到1994年对卑尔根大学的定期访问期间,这种合作就开始了。¹这个项目包括人员的互访和著作的相互出版,这本论文集就是这一制度化的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本书对作者和文本的选择也是由这一项目的视野所决定的。

作为这一项目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这本论文集的编辑者,我们感到中国哲学家和挪威哲学家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十分激动人心的。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的读者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这种跨越国界的哲学对话的乐趣。

然而,我们将面对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使中国的读者对这样一个选集感兴趣?作为编者同时也是作者,我们不敢自称毫无偏见,但是,为了对这一计划以及我们对文本的选择作出辩护,我们还是应该给出一个解答。也许,为了对在中国出版挪威哲学家的著作这种构想作出辩护,以下这些起码是可以说的:和其他的北欧国家一样,挪威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上,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介于”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用哲学的术

语说，“介于”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或者说，至少这一点曾经是事实：战后挪威哲学的历史，也是这一传统的鸿沟如何被作为主题加以讨论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克服的历史。当然，这种进展在好几个国家都发生了（在德国，这种倾向出现得比较早，最近，随着传统的分析哲学被宣告终结，以及后经验主义的哲学的扩张，这种倾向常常以后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在整个英语世界之中）。然而，在挪威，这种调和的工作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早于绝大多数的地区，²而且，即使它和国际性的讨论有密切关系，它也有其自身的特色。在我们看来，这一点就已经是向非欧洲读者提供这一时期挪威哲学讨论的一个选本的一个理由了。

进而言之，和其他的北欧国家一样，挪威是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欧洲国家。一些较大的欧洲民族如德国、英国和法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允许自己在文化上和语言上多多少少全心全意地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民族传统，而一些较小的民族则必须和所有人进行交流，包括文化上的交流——条件不允许他们从自己文化传统之内非反思地看待自己和看待他人，而必须出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学会从内和外两个角度来看待自己和他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在结构上具有强制性的自我反思和角色承当是相当令人难堪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比如，当欧洲以外的哲学家们在寻找既能够对欧洲哲学作熟门熟路的解释，又能够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民族传统的人的时候，它也许会变成一种优点。这至少是本论文集编者的想法，并以此来为向欧洲以外地区的读者介绍挪威哲学这一想法提供根据。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文本的质量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也许有人会问：这一选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对这一问题，兼为作者的编者也应该谨慎地回答，但是基本上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回答：本论文集所选的作者和文本并不代表挪威哲学在过去

60年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曾有那么多的哲学家³和哲学思潮,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篇幅不大的选本提出代表性的要求,没有太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于选择早期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也许有一种普遍的共识,尽管还可以加入其他一些作者的名字。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对作者的选择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本论文集旨在从“马可·波罗”项目的框架之内推进一种哲学对话。对过去的10至15年间的作者和文本的选择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选择这些作者和文本的目的在于推进参与这个项目的中挪两国哲学家之间的这种对话。

我们要补充的是,在这本论文集中,文本选择的标准不仅仅是某种抽象意义上的代表性,而是这样一种意图:即展开各种在讨论过程中具有相互联系的那些文本。

在讨论入选文本之前,我们要对阿恩·内斯[Arne Naess](1912—)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从30年代后期一直到战后,在复兴挪威哲学方面,内斯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30年代中期,内斯来到维也纳,在那里他有选择地参与了“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讨论班,内斯感到他们的经验主义不够充分,即这些哲学家并不通过从事(提倡)经验的研究,以期清楚地、准确地理解自己的语言。⁴这导致了经验语义学的奥斯陆学派的产生,⁵其代表作之一便是《非专业哲学家心目中的真理》(Naess, 1938),它基于对非哲学人员在谈论真理时所持的理解的经验研究。在维也纳期间,内斯撰写了他的关于“知识和科学态度”的博士论文(Erkenntnis und Wissenschaftliches Verhalten, 1936, 英格蒙德·古尔维依[Ingemund Gullvåg]将其英译为《作为一种行为的科学》),该文试图通过对科学行为作客观主义的描述来刻画科学认识。

内斯的经验主义以及他对人类行动作客观主义描述的努

力,引起了整个战后时期的激烈争论。但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内斯就已经表明(参见 Naess, 1936 年的结束语),他基本上持一种颇有怀疑主义色彩的立场。在其后的讨论中,内斯自己也参与了对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经验主义的瓦解,而转向一种(皮浪式的)自我反思的怀疑主义,最后走向一种多元的可能论。(参见《对总的观点、真理和知识的反思》,1959;《科学事业的多元论的可能论的方面》,1972;《怀疑主义》,1968;以及英格蒙德·古尔维依翻译的《哪一个世界是实在的?》)在许多方面,这一转变类似于(后来发生的)分析哲学从库恩[Thomas Kuhn]到法依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从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到罗蒂[Richard Rorty]的一般的转变。但是,不管他早期的怀疑主义和后来的可能论,也不管他会关于科学的经验主义解释以及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制度化的科学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如生态破坏)提出怎样的批评,内斯始终是一位开放的科学研究的拥护者。他是决不会乐滋滋地参加像罗蒂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读者的文学性对话的。作为一个心灵开放的可能论者,他始终是一个科学研究——即使不是戒律森严的科学——的快乐的支持者;也就是说,他一直是受哲学启蒙了的**探究[inquiry]**⁶的热情爱好者。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内斯显然从来就不仅仅是或不纯粹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哲学上所爱的首先是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混和着存在主义的和生命哲学的意味的斯宾诺莎。在这方面他受到了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彼得·维塞尔·扎普佛[Peter Wessel Zapffe]的影响(但内斯从未接受过他的进化的乐观主义)。因此,当内斯逐渐脱去了他的经验主义的外衣之后,他最终又以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了——作为一个“生态哲学家”,一个“深层生态学家”(除了选入本论文集的他的早期论文,还请参见内斯于 1989 年发表的著作《生态学、共同体和

生活方式》，还有他近期的论文《深层生态学“八点”之修正》，载乔雷奇·塞勋斯[Georege Sessions]编《面向 21 世纪的深层生态学》，波士顿，1995)。起源就是未来——那位黑森林哲人如是说。

内斯的生态学承诺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他对伦理问题或者政治问题的关切并不局限于近来的环境问题上。二战期间及之后，他阐发了一种非暴力的伦理学，这项工作把他引向了甘地和印度哲学(《甘地和核战争》，1965；《梵语常识》，1974；《甘地和团体冲突》，1974)。他将其非暴力的伦理学扩展到战后关于和平和核裁军的条件的各种讨论之中，还进一步扩展到他的深层生态学之中。在战后较早的一个时期里，内斯是发起对全权主义人格和政体进行心理学的和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以期对之有一个更好理解的人之一。而且，联合国还委托他对民主的概念(或者关于民主的各种概念——内斯更倾向于这么说)作一番语义学的研究(内斯等《民主、意识形态和客观性：对意识形态争论的语义学研究和认知分析》)。在此过程中，他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态度加强了。在有些阶段，内斯开始了对中国哲学的认真研究(作为例子可参见他和阿拉斯泰尔·汉奈[Alastair Hannay]合编的《中国哲学入门》，1972；《毛泽东：群众在从事哲学》，1974；《介于文化和反文化之间的科学》，1975)。

最后，内斯阐述语义学的结果不仅是一本关于“解释和精确性”的理论著作(内斯：《解释和精确性》，1953)，而且是几十年内所有大学生都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为了抵制公共生活中的非理性主义，所有的大学新生都受到在发现语义混淆的技巧方面的训练(《交往和论证》，1981)。在相当长时间里，起码一直到七十年代，几乎所有挪威哲学家都深受这种语义学怀疑主义的影响，其结果常常使它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

我们将内斯早期一本关于“作为一种行为的科学”的著作(Naess, 1936)的前五段作为本论文集的开篇。这种旨在对科学

行为作客观主义描述的尝试所引起的争论,把内斯引向了他的可能论,以及对经验主义的公开批判。在本论文集中,我们从他后期的一本著作,即《哪一个世界是实在的?》(Naess, 1969)中,选了一个体现这种可能论立场的文本。从内斯著作中选出的最后一个文本,是一篇关于深层生态学的经典性的短文。

汉斯·谢尔瓦姆[Hans Skjervheim](1926—1999)是内斯对人类行动作客观主义描述的主张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在其论文《客观主义和对人的研究》中(最早发表于1957年,后来于1959年作为奥斯陆大学“哲学问题系列”丛书的一种出版,最后于1974年发表在《探索》杂志上),主张“理解”[Verstehen]对关于人的研究的重要性。在本论文集中,我们选了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通过这篇论文以及他在以后各种争论中的许多论著和讲演,谢尔瓦姆为哲学和关于人的科学中的一种现象学的和解释学的研究进路作了辩护,对不仅存在于哲学中、而且存在于社会科学以及基于对这些科学的实证主义理解的社会各行各业的实践中的实证主义倾向作了批评(作为例子可参见《参与者和旁观者》,1957;《意识形态分析、辩证法和社会学》,1970),这种批评进而演化成对工具主义和技治论的广泛批评(参见《哲学与民主》,1992)。

在整个60年代,有许多年轻的哲学家追随着谢尔瓦姆,如奥顿·奥夫斯蒂[Audun øfsti]、奎纳尔·希尔贝克和达格·奥斯特贝格[Dag østerberg]。奥斯特贝格既是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在将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哲学引进挪威甚至整个北欧这一方面,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他在各种论坛上的众多的谈话和讨论,谢尔瓦姆对比他年轻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既有哲学家也有社会科学家,甚至还有学院以外的公共领域的学者。

谢尔瓦姆曾在德国做过多年研究工作,是战后复兴“大陆”

哲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其他重要的人物还有艾基尔·A·维勒[Egil A. Wyller],阿斯比昂·阿恩斯[Asbjørn Aarnes],古托姆·佛洛依斯塔德[Guttorm Fløistad]和拉斯·洛尔·郎斯勒特[Lars Roar Langset].“大陆”这个术语是打引号的,因为逻辑经验主义曾是一种维也纳特产,还因为“大陆”哲学的拥护者,如谢尔瓦姆,多半从不采取古典的德国式(或法国式)写作方式。分析哲学在论证方面的优点,也广泛地被这些哲学中现象学进路和解释学进路的倡导者们所认同。

这后一点,在雅可比·梅里奥[Jakob Meløe](1927—)那里尤其引人注目。梅里奥也反对内斯式的对行动的客观主义描写的尝试。我们为这本论文集选了他的一篇文章《行动者及其世界》(1970)。通过对实例的细致分析,通过主张联系其背景对行动进行一种“实践学的”描述,梅里奥试图表明这样一种描述的必要性,它既克服客观主义(行为主义的)的描述,又克服一种用对意向的指称加以补充的客观主义描述。梅里奥由此也试图证明,一种对这类行动的前提条件的分析如何是可行的,这样就对“偶然的必然性”[contingent necessities](以及在此意义上的一种弱的先验推理)进行了辩护,反对一种(在早期内斯那里可以找到的)终点开放的可能论。从这个角度出发,梅里奥(以及他的追随者如卡尔·埃利克·库尔[Carl Erik Kuehl])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早期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某种共同立场作出了一种原创性的阐述。把他的这类工作称作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趣味问题。也许可以把它称作分析的现象学。作为一种现象学,它是一种着手做了的现象学,而不是一种只谈论如何做现象学研究而不实际做的提纲式的现象学。

和谢尔瓦姆一样,梅里奥也有不少活跃的追随者,他们继续了他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并且特别是联系人文学科和艺

术来进一步发展这项工作。著名的有谢尔·S·约翰内森[Kjell S. Johannessen]和托雷·诺顿斯坦[Tore Nordenstam](在入选本论文集的作者中可以找到他们),以及哈罗尔德·约翰内森[Harald Johannessen]和维果·若斯瓦尔[Viggo Rossvaer]。

内斯、谢尔瓦姆和梅里奥都是奇魅式的人物,他们通过口头讨论对他们的追随者(和反对者)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在各种讨论班和会议上,在公共咖啡馆和私人寓所里参与一种真正的“哲学的实践”。从这方面说,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的讨论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意味。由于这个原因,这段时期哲学发展中一个重要部分没能被现有的文本所包含。

克努特·埃力克·特伦诺伊[Knut Erik Tranøy](1918—)是在英国和美国受的哲学教育。二战中,一批挪威学生于1943年秋在奥斯陆大学被集体逮捕,之后被送往德国的集中营,特伦诺伊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对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兴趣是根深蒂固的。他接受了分析哲学的训练,较早地从元伦理学转向了伦理学(参见他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论规范体系的逻辑》,1953),后来又从伦理学转向了应用伦理学(比如《科学—社会力量 and 生活方式》,1986;《我们时代的医学伦理学》,1991)。特伦诺伊不仅从逻辑的角度看待科学,而且把它看作一种行动,十分重视内在于这种行动的各种规范,在本论文集所选的文本《研究的规范:作为规范性体系的方法论》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研究的进路。

达格芬·弗莱斯达尔[Dagfinn Føllesdal](1932—)在哈佛求学(师从蒯因[W. V. O. Quine]),从这方面说,他接受了分析哲学的训练,但同时也曾广泛地研究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本文集收入的论文中,他的《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1972)——代表了克服这两个学派之间隔阂的一条途径。

英格蒙德·古尔维依(1925—)在内斯的影响下开始了其学术生涯,但是逐渐地,他发展出一种分析地讨论——用他的入选本论文集的论文(发表于1985年)的题目来说是——“合理性和客观性的条件”的语用哲学。在这个领域中,就其试图对一般的行动、尤其是对认知行动的前提条件获得更好的洞见而言,古尔维依提出的问题和阿佩尔[Karl-Otto Apel]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普遍语用学的问题颇相类似。但是,他的研究方式明显地带有他在分析哲学方面所受的训练的印迹。

杨·埃尔斯特[Jon Elster](1940—)在他丰富的学术生涯中,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社会选择理论出发,在介于哲学和关于人的科学之间的领域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本论文集中,我们选择了他的一篇论述市场和公共空间之间关系的文章《市场与论坛:三种政治理论》(1982)。埃尔斯特曾卷入了各种不同的争论,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意义的东西和无意义的东西的争论(《理解马克思》,1985),关于功能主义说明之方法论地位的争论(《说明和辩证法》,1979)。

在挪威的背景中,埃尔斯特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受到了像奥农德·哈伽[Ånund Haga](1943—)这样的人的批评,哈伽为社会科学中一种辩证的主体间性进行辩护。他的入选文本的题目是“社会科学和博弈理论”(1991)。

从五十年代开始,来自德、法的现象学重新获得活力,与此相连,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在挪威哲学界颇有影响。杨·海勒斯尼斯[Jon Hellesnes](1939—)是对这些活力作出创造性阐述的哲学家之一。和绝大多数他这个年龄的哲学家一样,海勒斯尼斯接受的也是分析哲学的训练。但是和他的绝大多数同行不同,他常常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既写随笔也写小说——确切地说,文学随笔和哲理小说(从1968年的随笔《自我知识和陌生的心

灵》到1986年的小说《后现代的学院》)。这里,我们选了他的一篇讨论解释学和日常生活经验的文章《解释学和日常理解》。

在那些最初经过梅里奥的中介而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哲学家中,我们选了谢尔·S·约翰内森(1936—)和托雷·诺顿斯坦(1934—)。他们都从这种维特根斯坦式的视角出发,对美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且对这种哲学视角本身进行了阐述。正如我们可以在其入选本论文集的文章《遵循规则、非传递性理解和默会知识》中所能看到的那样,约翰内森对实践和默会知识的思想作出了精妙的阐释(1990)。诺顿斯坦对伦理的推理作了精妙的阐释,为此他既批判其他立场,如我们可从其入选论文《从“是”到“应当”——演绎还是阐明?》中看到的那样,他也致力于阐发一种语境化的伦理学(如《苏丹人的伦理学》,1968,此书是他在喀土穆生活了5年之后所作)。

拉格纳·费尔兰德[Ragnar Fjelland](1947—)受过哲学训练,也受过物理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教育,去过德国、加拿大和美国,也去过吉隆坡。他的领域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认识论方面和规范方面。在其入选论文中,他阐述了在技术、几何学和生活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各认知方面的一种现象学进路:“从进化认识论到先天的生活世界”(1994)。

尼尔斯·吉列尔[Nils Gilje](1947—)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哲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哲学。所选的论文《汉斯·尼尔森·豪格[Hans Nielsen Hauge]与资本主义精神》(1994),讨论的是文化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对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早期在挪威推进“资本主义精神”的汉斯·尼尔森所作的一个“韦伯[Max Weber]式”的研究(尼尔森相当于韦伯的研究中的加尔文[Jean Calvin],尽管他更加重视团体之团结的集体伦理,而相对淡化了对个人主义的和“占有性的”伦理的强调)。

在很大程度上,哈罗德·格里门[Harald Grimen](1955—)和吉列尔拥有相同的研究领域,虽然他把重点放在行动理论和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思想上。在本论文集,我们选了他的《合理的分歧和认知的退让》(1994)。

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1937—)深受维特根斯坦式的实践学与批判理论和普遍语用学的影响。其入选论文《情境语用学与普遍语用学》(1990,1996 修订)试图融合这两种研究进路,并试图弥合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鸿沟。

总之,这些入选的文本,是对过去几十年间一个欧洲小国中所进行的许多讨论的一个概略的回顾。但是,正因为它是一个相当有限的选本,对本世纪后 50 年欧洲哲学的某些方面而言,它有望成为一种有用的导引。

最后,也许有人会问:挪威哲学,这里所介绍的、声称会使别人产生兴趣、使那些边界以外的人产生兴趣的这种挪威哲学,到底有什么特长?本论文集的编者想尝试性地提出以下几点:与言语行动和关于人的研究有关的认识论讨论,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哲学、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哲学,以及伦理学,包括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其他人也许会强调其他领域,如美学或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读者可以对我们(编者)在这本论文集所提供的内容的背景,作出自己的判断。哲学,我们认为,存在于不断进行着的种种讨论之中,而本书就是这些讨论之一。

本文集的编辑委员会包括如下成员: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论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SVT)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gen]的拉格纳·费尔兰德[Ragnar Fjelland]、尼尔斯·吉列尔[Nils Gilje]、哈罗德·格里门[Harald Grimen]、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

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奎纳尔·希尔贝克为项目协调人。

编辑委员会感谢卑尔根大学人文学院和 L. Meltzer 基金会对本项目的宝贵支持,感谢所有作者的善意合作,感谢先前的出版者允许重印文集集中的文章。

注释:

1. 见 Tong (1994)。

2. 比如,Apel 和 Habermas 于 50 年代在德国遇到 Skjervheim,并从对“客观主义和对人的研究”的批判中受益匪浅。参见本论文集中 Skjervheim 的入选文本,以及 Habermas 的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第 1 卷(1981)的以下段落,英译本第 111 页:“那么,在那些必须通过解释才能通达其对象领域的科学中,理解的特殊的方法论困难到底在哪里? Hans Skjervheim 在 1959 年就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指 *Obje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实际上此书出版于 1957 年——Skirbekk 注)。他是那些重新发起关于社会科学的客观主义争论的人之一,这场争论由 Richard Bernstein 在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1976)一书中所作的广泛考察而暂时告一段落。由于 Peter Winch 的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一书的夺目光辉,以下事实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即 Skjervheim 是第一个搞清楚 Verstehen [理解]问题在方法论上令人震惊的后果的,也就是说,是第一个搞清楚关于 Verstehen 存在着什么问题的人……”

3. 在奥斯陆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slo]哲学系,大约有 50 位具有终身职位的哲学家,在卑尔根[Bergen]、特罗德海姆[Trondheim]、特罗姆索[Tromsø]的哲学系中,大约各有 20 位具有终身职位的哲学家。

4. 参见 *Wie foerdert man heute die empirische Bewegung;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Empirismus von Otto Neurath und Rudolph Carnap*,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56。

5. 主要人物有 Ingemund Gullvåg, Arild Haaland, Harald Ofstad 和 Hermann Tennesson。

6. 他在 1958 年创办了一份以此为名的期刊。